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学科丛书

产品空间 与比较优势演化路径的比较

——基于亚洲典型国家中等收入阶段

张美云 / 著

CHANPIN KONGJIAN YU BIJIAO YOUSHI
YANHUA LUJING DE BIJIAO
——基于亚洲典型国家中等收入阶段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学科丛书

西北政法大学陕西省理论经济学优势学科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产品空间与比较优势 演化路径的比较

——基于亚洲典型国家中等收入阶段

张美云 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产品空间与比较优势演化路径的比较：基于亚洲
典型国家中等收入阶段/张美云著. —北京：经济
科学出版社，2019. 5

ISBN 978 - 7 - 5218 - 0548 - 2

I. ①产… II. ①张… III. ①经济学 - 研究
IV. 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95321 号

责任编辑：程晓云
责任校对：王肖楠
版式设计：齐 杰
责任印制：王世伟

产品空间与比较优势演化路径的比较

——基于亚洲典型国家中等收入阶段

张美云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总编部电话：010 -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010 - 88191522

网址：[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天猫网店：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http://jjkxcbs. tmall. com](http://jjkxcbs.tmall.com)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10 × 1000 16 开 17 印张 350000 字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218 - 0548 - 2 定价：4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 8819151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打击盗版 举报热线：010 - 88191661)

QQ：2242791300 营销中心电话：010 - 88191537

电子邮箱：[dbts@ esp. com. cn](mailto:dbts@esp.com.cn))

2007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用以解析多数中等收入经济体增长放缓甚至停滞而难以迈进高收入的现象。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经济增长及其动力转换，而产品空间演化推动的产业升级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中国2010年迈进上中等收入水平，目前处于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基于对中国的借鉴价值，本书选取同处亚洲区位、目前位于上中等或高收入水平、具有一定发展规模、非矿产资源型等的日本、韩国、中国、泰国和马来西亚为研究样本，采用产业升级领域近期前沿的产品空间与比较优势演化理论，通过各国中等收入阶段产品空间与比较优势演化路径的比较，结合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来探究中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产业升级路径。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书将产品空间理论思想和指标体系主要拆分为四个维度进行实证研究：第一，已有生产能力禀赋及其影响因素的比较。经济复杂度是产品空间理论中偏向宏观的指标，可以定量测度已有生产能力禀赋。第二，已有生产能力禀赋对产业升级路径的影响。显示性比较优势和密度是产品空间理论中偏向微观的指标，可以细化和具象化产业升级路径。第三，产业升级潜力的比较。产品空间理论不但可以解释还可以预测经济增长。第四，产业政策的比较。产品空间理论认为产业政策不可或缺，政府应积极解决信息外部性及协调外部性问题。

通过以上研究并结合中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现实挑战，主要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第一，各国中等收入阶段能力禀赋从大到小依次为日本、韩国、中国、泰国和马来西亚。中国仍需持续提升经济复杂度，进一步关注物质资本的流向和使用效率、优化FDI的利用结构并合理分配使用去向、明确动态调整金融支持政策以改善金融支持效率、适度提升贸易开放度等。第二，各国产业升级路径优化程度从

2 产品空间与比较优势演化路径的比较

大到小依次为日本、韩国、中国、泰国和马来西亚。中国的低复杂度产品短期内仍有一定的升级空间，但长远必须构建较健全的产业进退机制，促进能力资源向更高复杂度产品领域优化配置，实现跨越式发展。第三，各国产业升级潜力从大到小依次为日本、中国和韩国接近、泰国强于马来西亚。各国实践表明经济增长需要匹配一定数量的优势产品，在具备一定优势产品数量的前提下，更重要的是优势产品的具体构成、所有产品的发展潜力。中国优势产品种类具有明显优势，但面临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优势产品的复杂度和缩减产业升级的能力距离等问题。第四，各国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从优到差依次为日本、韩国、中国、泰国和马来西亚接近，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带动的产品、价值链和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缩减收入差距、国内金融体系完善程度、内生人力资本的培育、节能环保等方面。中国未来需要适时动态调整产业政策，注重培育本土化的人力资本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持续优化出口结构以带动产业升级、适度利用并限制 FDI 的具体流向等，增强发展动力，切实转变粗放的发展方式。

本书的创新点包括：第一，对已有理论的补充和深化。目前在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文献中，定性的现象阐述及比较研究较多，理论支撑较少。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经济增长及其动力转换，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产业升级，而产品升级是产业升级的根源。产品空间理论基于产出导向和能力提升视角，丰富了比较优势的内涵，构建了经济增长绩效的统一分析框架，可以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有力的解释。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和进一步明晰产品空间理论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解释框架，是对产品空间理论和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的补充和深化。第二，对已有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性应用。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是目前中国发展的难点热点问题。对比世界各个经济体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教训，产业能否顺利升级是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本书基于产品空间理论，采用国际新兴的经济物理学等研究方法，对五个样本国家中等收入阶段产品空间与比较优势演化的路径进行可视化描述及分析，属于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等领域的实证研究，创新性地应用了相关学科部分已有理论和研究方法。本书将为相关经济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提供经验支持，对解决同类现实问题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目 录

CONTENTS

第 1 章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1
1.2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界定	12
1.3 数据来源和典型样本国家的筛选	17
1.4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26
1.5 研究内容、主要观点和框架结构	28
1.6 研究难点和创新点	32
第 2 章 文献综述	34
2.1 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进展	34
2.2 产业升级理论的研究进展	47
2.3 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研究进展	57
2.4 本章小结	59
第 3 章 产品空间理论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解释	61
3.1 产品空间理论的主要特色	62
3.2 产品空间理论的基本内容	63
3.3 产品空间理论的核心指标及其测度	66
3.4 产品空间理论的局限性和争论	69
3.5 运用产品空间理论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进展	72
3.6 解释框架	75
3.7 本章小结	78

2 产品空间与比较优势演化路径的比较

第4章 中等收入阶段的基本特征比较	79
4.1 主要经济指标的比较	79
4.2 主要社会指标的比较	89
4.3 主要制度指标和其他指标的比较	93
4.4 本章小结	96
第5章 中等收入阶段生产能力禀赋及其影响因素的比较	98
5.1 简要文献回顾	98
5.2 各国经济复杂度和经济增长绩效的比较	103
5.3 各国经济复杂度影响因素的实证比较	108
5.4 基于中国的进一步分析	119
5.5 本章小结	121
第6章 中等收入阶段生产能力禀赋对产业升级路径的影响比较	132
6.1 简要文献回顾	133
6.2 变量选择、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	135
6.3 按时期划分的实证结果分析	138
6.4 按四大类产品划分的实证结果分析	142
6.5 基于中国的进一步分析	151
6.6 本章小结	151
第7章 中等收入阶段产业升级潜力的比较	153
7.1 简要文献回顾	154
7.2 各国产品空间图演进的比较	155
7.3 各国复杂性展望指数和能力距离的比较	163
7.4 各国不同显示性比较优势区间值的产品构成比较	165
7.5 各国不同 RCA 区间值产品复杂度和能力距离的比较	174
7.6 基于中国的进一步分析	179
7.7 本章小结	179
第8章 产业政策的比较	185
8.1 简要文献回顾	185

8.2	各国产业政策演进的基本事实	189
8.3	各国产业政策的特征总结及比较分析	203
8.4	本章小结	210
第9章	比较研究对中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启示与借鉴	211
9.1	中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挑战	211
9.2	跨国比较研究对中国的主要启示与借鉴	223
9.3	中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路径	225
9.4	本章小结	227
第10章	结论与展望	229
10.1	研究结论	229
10.2	研究局限	231
10.3	研究展望	232
参考文献	234
后记	260

第 1 章

绪 论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 MIT）是一个综合问题，结合世界典型成功者的经验和失败者的教训，本书将从产品空间视角探讨中国规避 MIT 的可能路径。产品空间演化推动的产业升级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产品空间与比较优势演化理论（简称产品空间理论）是产业升级领域的近期前沿理论。故本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对产品空间理论、MIT 和经济增长等若干理论的回顾和分析，基于中国与亚洲典型国家的国际比较并立足中国现实，探究中国规避 MIT 的产业升级路径。本书的产业升级限定为产品升级、不涉及服务。

本章是绪论部分，首先阐述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然后在对 MIT 概念进行界定和主要数据来源进行说明的基础上，明确样本国家和研究方法，并在研究思路的指引下细化框架结构，最后指出研究难点和创新点等。

1.1 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从 21 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状况来看，除了欧美发达经济体和其他部分矿产资源型经济体，其他很多经济体从低收入跨入了中等收入阶段，但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少数经济体跨入了高收入行列。拉丁美洲多数经济体在经历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快速增长之后就发生了经济停滞，至今人均年 GNI 徘徊在 5000 美元左右，各种社会问题凸显，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发展的道路上面临着诸多困难。还有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曾经历了经济快速增长的亚洲经济体，至今也没有跨入高收入阶段（张美云，2016）。世界各

国经济增长的实践和结果引发了公众的思考，相比于低收入阶段的粗放式发展和高收入阶段较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支撑的发展，中等收入阶段发展显然面临更多挑战和困难，该如何破解发展困境呢？

2007年，世界银行在《东亚复兴——经济增长的思路》中第一次阐述 MIT 的概念（Gill, Kharas & Bhattasali, 2007），又在 2010 年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对 MIT 做了详细的解析（World Bank, 2010）。其基本涵义为：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仅有极少数能成功迈进高等收入阶段；限于经济发展依然过于依靠外在因素，多数经济体经济增长内在驱动力欠缺，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多发，不能顺利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经济增长极其缓慢甚至陷入停滞。吉尔和卡拉斯（Gill & Kharas, 2015）再次指出 MIT 表明中等收入经济体需要在有效的政府公共政策引导下，应对“刘易斯拐点”和以产业内部资源重配为主的技术升级等难题。现实中，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产业发展同时面临发达经济体高端产业挤出和其他中低收入经济体低端产业挤压的双重困境。近年来，MIT 的内涵、成因、规避对策等相关问题，引起了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多国政府和众多学者的关注和争论。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顺利实现崛起，2001 年从低收入进入下中等收入阶段，2010 年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成为制造业领域的“世界加工厂”，正在探索实践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型道路。基于国际经验，一个经济体跨入上中等收入水平后，必须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以加快产业升级，才能顺利迈进高收入阶段，否则将陷入 MIT。MIT 是一个增长问题，也是一个发展问题（权衡、罗海蓉，2013）。规避 MIT，其实质就是改变比较优势，从而推动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位置演进，即实现产业升级（张其仔，2014）。在 MIT 问题的提出、国际经济秩序动态调整、国内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创新创业型国家的构建等现实背景下，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不足、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局限等理论背景，采用产品空间理论探究中国规避 MIT 的产业升级路径极具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1. 现实背景

（1）国际经济新秩序与动态比较优势。

“二战”后至今，以西方发达经济体为主导构建了基于市场导向、遵循实力决定竞争的国际经济秩序。多年来，发达与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实力对比的动态演进，决定着国际经济秩序变迁的跌宕起伏。近年来，多数发展中经济体获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长，全球经济逐渐趋于平衡，但是发展中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实力依然存在差距。在可以预测的未来，很难出现替代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立足市场导向

的基本理念（徐崇利，2012）。

就中国而言，其改革开放后一直立足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如企业将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与引进的技术和管理制度相结合以应对市场竞争、国家将贸易自由化的自主推进与经济全球化发展有机结合等。这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活力，获得了能够适应国际市场需求的产品出口综合优势，而国际市场的相对稳定又使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生产能力和市场规模渐进扩张，在许多商品市场上都达到了具有“相对垄断优势”的地位，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影响力日渐提升，也为中国经济走向世界并不断融入全球化奠定了基础（彭支伟，2012）。作为新兴经济体代表的金砖国家成员国之一，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国际经济秩序构建中的话语权也有明显提升。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个经济体围绕应对危机、恢复及促进经济增长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调整的实践，引致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彼此内部及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在全球化背景下加剧，也促使国际经济秩序进入新的调整变迁阶段。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纷纷采取“再工业化”措施，积极推进本国生物、信息、航天航空和新能源等高端产业的发展，鼓励高科技产品出口。而且还以保护本土就业岗位和调整外汇收支等理由，从而倡导增加储蓄并减少消费，不断缩减各类产品尤其是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给一直立足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国带来了极大挑战和压力。与此同时，印度、洪都拉斯和斯里兰卡等发展中经济体，基于更具比较优势的各类低要素成本，与中国生产相同或相近的产品，不断增加向西方经济体的出口。种种外部环境的变化，使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同时面临发达经济体高端产业“挤压”和部分发展中经济体低端产业“挤出”的双重困境（林岗，2011）。

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遵循各类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和参与国际分工，较迅速地实现了经济崛起。但如今，多年来的经济增长模式尤其是工业化道路面临调整的外在压力现实存在，而且迫在眉睫。在未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加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应基于动态比较优势，在维持和深挖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和贸易比较优势的同时，需要侧重强化自主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不断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和增强经济的内生发展能力，在更高更深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动态演进中扮演好自身的角色（权衡，2014）。

（2）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挑战。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积累了一些规模较大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经济飞速发展，1978~2015年的年均增速为8.67%。按照世界银行2015年的收入水平

划分标准，中国 2001 年人均 GDP 为 1053 美元，脱离了低收入阶段并进入下中等收入水平；2008 年人均 GDP 首次突破 3000 美元，达到 3471 美元；2010 年人均 GDP 首次突破 4000 美元，达到 4561 美元，开始迈进上中等收入水平；2015 年人均 GDP 为 8028 美元，尚未迈进高收入阶段（张美云，2016）^①。其间，2001 ~ 2009 年和 2010 ~ 2015 年的经济年均增速分别为 9.91% 和 7.8%。

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后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中国自从 2008 年起增速放缓，经济运行进入了一个拐点。目前，中国经济已经整体上迈入上中等收入阶段，部分东部地区已经进入高收入阶段，但不少中西部地区刚刚进入中等收入阶段。虽然中等收入阶段与 MIT 没有必然的联系，但目前中国开始出现拉美经济体落入 MIT 后的一些现象，如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业急需升级、城市化过渡、收入分配不均等。面对这一现实问题，政府和学者达成的共识是，中国未必会落入 MIT，但急需规避陷入其中的风险。

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产业能否顺利升级在 MIT 的规避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产业升级不但包括产业结构调整或产业转移等，也包括产业价值链提升和产品升级（张妍妍，2014）。产业升级可能是原有产业的升级，也可能是新产业的产生。产业升级需要解决好升级的方向、幅度和中断风险等问题（张其仔，2008）。一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土地、劳动力等各类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会逐渐下降甚至消失，产业升级容易发生断档，从而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滞。目前，我国正处在产业升级的关键阶段，如何推动产业顺利升级以积极规避 MIT，是急需应对的一个重大问题。

（3）推进经济新常态与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

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1997 年，全球经济历经近 20 年的稳定增长时期，呈现某种常态化发展，这为新常态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提供了背景参照。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乃至之后的欧债危机，持续时长、影响面广，导致多国经济增长乏力、增速下降、产能过剩、结构失调等，社会矛盾频发。立足这种新情况，美国风险投资家罗杰·麦克纳米于 2004 年首次提出新常态的概念，意即经济增长无法回到过去的辉煌，从而迈进了一个无法预知未来的新常态时代。美国另外一名风险投资专家穆罕默德·埃里安于 2010 年在“工业化国家新常态启航”的演讲中，进一步对新常态做了多角度阐释，促使新常态迅速成为一个广为传播的概念（汪红驹，2014；涂小雨，2015）。

^① 世界银行的收入水平划分标准采用人均 GNI、人均 GDP 和人均 GNI 接近且数据易得，全书收入水平划分数据均采用人均 GDP。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数据更新日期 2016 年 12 月 28 日，访问日期 2017 年 1 月 20 日。

中国因体制差异、自身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融入全球化程度有限等原因,受国际金融危机的不良影响较小,但也出现了以上新常态表象。如中国经济增速改革开放后多年年均近10%,但2011年后持续下降,目前稳定在7%左右的中高速水平。中国不但经济增长从多年的高速转为中高速阶段,同时也面临发展方式滞后、产能过剩、结构不合理和动力不足等困境。基于此,习近平于2014年5月在河南视察工作时首次提出经济新常态,之后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新常态做了进一步解释。此后,立足理论并结合实践的高度上认识、适应和发展新常态经济的发展阶段就此开启。但是,与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新常态相比,中国的新常态与其有诸多相似表象,却有本质不同。他们是长期深陷危机、经济增速接近零甚至负值的衰退状态一种理论概括,属于消极防御性的新常态。中国是经济增速适度放缓、以退为进、谋求转型升级和自主创新的新常态(田雪原,2015)。按照习近平的多次表述以及厉以宁等学者的观点,经济新常态就是新的常态化的某种经济状态,需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经济新常态有三个主要特点,涉及经济增长减速、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三个方面,就是经济增长从高速向中高速转变、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霍小光、王骏勇,2014;彭向升,2015)。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积极规避MIT是中国面临的一个现实难题,二者存在密切的关系,具体分析可以从速度、结构和动力三个方面进行。

第一,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需要一定的发展速度。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速度减缓是一个明显的特点。因为经济增速与经济总量成反比,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速度必然放缓。而且经济增速也会因资源约束等有所浮动。参照国际经验,成功跨越MIT的经济体,在历经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后,一般会转入12~15年5%~7%的中高速增长阶段。但那些陷入MIT的经济体,一般会面临年均增速在0.8%~2.0%长约20年的困境期,经济增长长期放缓甚至停滞。从中国经济年均增速看,1978~2015年为8.67%、2001~2015年为9.07%,这与跨越MIT阶段时的日本和韩国相似。已有的多年高增速基础,可以为目前及未来一段时期的中高速阶段储备回旋空间。而陷入MIT的拉美各经济体,其高速增长期的年均增速一般也只有4%~7%。以史为鉴,经济减速并不可怕,但减速不能失速。只要中国能长期保持5%~7%的增长速度,就可以进入中高速增长和上中等收入阶段相匹配的新常态,成功规避MIT(汪红驹,2015)。

第二,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新常态下,中国面临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要求及时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谨慎应对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风险。借鉴国际经验,中国要顺利跨越MIT,急需确定经济

结构优化的路径与策略。经济结构优化涉及需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多个领域。只有采取一定措施优化了经济结构，才可能推进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产业结构优化是其中关键的一环。因为产业结构优化对需求结构、就业结构等影响较大，而且产业结构优化会带动相关科技研发等创新活动，正向外溢效应明显（方焯，2015）。

第三，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创新驱动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经济新常态下，增长的动力需要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这一变化也符合规避 MIT 的要求。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只有同时关注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通过发展教育、增加研发投入、完善基础设施等促进自主创新，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新动力，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产业升级、提升中国产品和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并最终规避 MIT（刘伟，2015）。

总之，中国的经济新常态与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关系密切。二者最终统一于一致的发展目标，即寻求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力以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因为经济增长不但改善人民生活、提升综合国际竞争力，也是中国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的核心物质基础。

（4）建设创业创新型国家的当代意义。

自熊彼特基于对经济发展机制的解释首次提出“创新”概念后，引发了多位学者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理解“创新”。波特明确提出“创新型国家”的概念，并将国家划分为要素推动、投资推动、创新推动和财富推动四个竞争发展阶段。要素推动型国家（多处于低收入水平）主要依靠自身丰富的资源禀赋谋求经济增长，比较优势来自资源和成本，但创新能力薄弱甚至缺失。投资驱动型国家（多处于中等收入水平）主要依靠全球技术资源的本土化生产，以融入全球生产体系，并不断改进本国技术，但尚未实现从模仿到创新的彻底转变。创新型国家（基本均处于高收入水平）重视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及提升，利用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增强国际竞争力。这类国家一般具有科技创新投入高、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自主创新能力强和创新产出高等共性特征（陈娜娜，2013）。

虽然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中连续的行为，但是创新型国家则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二战”结束以来，伴随殖民体系的瓦解、全球化加速推进和各个经济体谋求发展的过程等，人类社会总体生产力水平已经高度发达、部分经济体能够从事相对专门化的科技创新产品生产，科技发展为自主创新提供理论支持和技术平台，社会经济发展开始提出突破自然资源与空间制约的要求、为自主创新提出客观与现实要求，科技和经济的高度化发展形成具有等级梯次的国际经济体系和

技术发展链条等，出现了作为一种国家类型的创新型国家（赵凌云，2006）。基于创新型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来看，必须把国际市场所提供的机会和国内投资以及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如明晰产权和增加控制权等，从而激发本土企业家的创新创业活力。创业是一种重要的创新形式，创新与创业具有交互作用，创新型国家必须有创业型社会的支撑（罗德里克，2009）。创业意识的激发和创业活动的推动，将为国家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持久的动力支持（徐占忱、肖广岭，2008）。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探索实践，目前综合国力仅次于美国，但是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依靠资源的高投入和劳动力的低成本等，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业升级乏力，而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也正在逐渐丧失。为改变这一现状，中国自2006年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共十七大、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也多次强调“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鼓励创业带动就业”等，并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和《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等政策文件。创新被置于2015年10月29日中国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首位。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指引下十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持续进步和快速积累，但是部分产业的核心技术仍然受制于人、大量关键设备依赖进口、创新能力和研发水平偏低，与国际竞争力的需求也不匹配。从国际经验来看，日本、韩国在中等收入阶段，主要是通过自主创新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技术，主导了国内市场，并支撑起一大批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从而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李元元，2006）。

参照国际经验，中国应加强加快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及提升，推进产业技术创新，依托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革新传统产业，逐渐形成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的主导产业和进入全球生产体系的高端产品市场，持续提升产业竞争力（尹广文，2015）。尤其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的新形势下，中国急需规避MIT，比较优势的演变和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对创新的依赖度越来越高，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和现实意义。

（5）新常态下产业升级是供给侧改革中的必选路径。

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弱化或规避弱势，通过供给侧改革激发更多的发展活力和探索更好的发展路径，是一个具有高度实践意义的现实课题。面对新的国内外形势，从时间演进维度来看，经济新常态是发现问题后最初形成的判断，五大发展理念是分析问题时构建的应对思路，供给侧改革是解决问题的有力对策（钟祥财，2016）。新常态下，从人均收入水平、国际地位、以产业结构为表征的经济

结构优化等指标看，中国的国际化和工业化等均迈进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但与世界一流发达经济体还存在较多差距。但作为一个人口和经济总量大国，中国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巨大的市场、多元化经济的层级化空间、较完备的产业体系等明显优势（刘友金、胡黎明，2011；张美云，2017），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依然具有明显的发展潜力。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失衡的表象看似总量失衡，其实根本原因在于结构失衡。应对这一难题，需求侧调控无法深入到结构而难以奏效。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对生产者和劳动者施加影响，提升其效率和积极性，并在效率提高的基础上促进产业结构演进升级。总体而言，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在创新驱动下提升效率并创造优质投资机会，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从根源上说，结构演进推动效率提升，效率提升引致创新，而市场经济体制下创新的主体正是生产者和劳动者。基于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产业升级是从根本上克服新常态下结构失衡的必选路径（刘伟，2016）。

2. 理论背景

（1）比较优势理论的不足。

比较优势理论在经济学领域的地位相当重要，也无须过多渲染。从斯密基于分工的内生绝对优势到李嘉图基于资源禀赋差异的外生比较优势，再到赫克歇尔和俄林基于生产要素比例差别的 H-O 模型，主流的静态外生比较优势理论逐渐在演进中不断完善。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赫尔普曼、克鲁格曼和格罗斯曼等学者引入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等因素推动形成了动态内生比较优势理论的新主流，之后杨小凯、博兰、费希尔等学者从专业化、技术差异、制度创新等多个视角对这一新主流理论进行了拓展。

比较优势理论长期以来一直是指导世界尤其是发展中经济体参与国际分工、进行国际贸易、推进产业升级等的经典理论之一。参照比较优势理论的逻辑，各经济体的产业在初始阶段要以要素自然禀赋为基础，逐渐实现资本积累和技术升级，从低端产品或产业迈向高端产品或产业，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然而在现实中，随着全球化推动下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等内外环境的变化，不少发展中经济体要素成本等比较优势逐渐下降甚至消失，有些经济体已经陷入了“比较优势陷阱”并引致 MIT。这一现实致使比较优势理论面临质疑和挑战。比较优势理论的演进使其逐渐完善，但并不完美，其局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论前提的诸多不足。比较优势理论假定各经济体生产条件和供给条件不变、市场完全竞争、劳动生产率固定但不同、生产要素国内自由流动但不能

跨国家（地区）流动、劳动力充分就业、国际贸易无关税等交易费用和运输费用、国际经济处于静态、一国进出口总是相等、国际贸易的形式是物物交换等。这些理论假设前提不仅与经济事实不符合，也与发展中经济体目前所面临的本土及国际发展环境相差甚大。

第二，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引致的不良后果。比较优势理论采用了西方经济学常用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思维逻辑，发展中经济体不太可能也不必要进行自主创新，只需要从事目前能带来收益的经济活动，具有潜在收益的研发创新活动应被或只能被见效快、风险低的技术引进和模仿等手段替代。基于这种考虑，发展中经济体对发达经济体技术的引进或模仿，比起自主创新是一种更加低投入、低成本和低风险且见效快的经济行为。但长此以往，发展中经济体将逐步丧失核心技术和主导产业，产业升级乏力，整体竞争力难以提升，长期成为技术追赶者，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

第三，理论结论的现实挑战。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各个经济体之间比较优势是静态恒定的，彼此间差距越大，所带来的贸易空间越大。以此推论，当前的国际贸易理应主要存在于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但现实中当前的国际贸易主要存在于各类禀赋接近的发达经济体之间。各经济体的比较优势也不是固定不变，而是不断动态演化的。作为对静态内生比较优势理论的超越，动态内生比较优势理论关注了分工和技术等的内生作用，但建立在新古典基础上的分工理论也对现如今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缺乏解释力，更无法深刻揭示出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国际分工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不良影响（林岗，2011；陈亮，2011）。

（2）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局限。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价值链、增值链、商品链和全球价值链四个阶段。波特（Pouter，1985）强调单个企业的竞争优势，基于企业层面首次提出了价值链的定义，即公司的价值创造过程包括生产、营销、运输和售后服务等基本活动和技术、人力资源和财务等支持性活动两大部分。波特的研究奠定了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基础。科格特（Kougt，1985）研究了国家比较优势和企业竞争能力之间的关系，将价值链理论推广到国家和区域层面。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2002）将全球价值链定义为“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涉及从原材料采购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及销售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在此前后，格里菲（Gereffi，1994）、斯特金和李等（Sturgeon & Lee et al.，2001）进一步拓展了全球价值链理论。目前，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宏观层面包括全球、区域和国家，中观层面包含产业链和供应链，微观